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一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03b)

---

【史实辨析】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 钢
【史海钩沉】	康生的另一面	余汝信
【读史札记】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史一平
【历史回顾】	还原林彪，部下黄永胜填历史空白	江 迅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实辨析】

###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 韩 钢 •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

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1〕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 ◇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5〕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

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7）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8）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的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9）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10）《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11）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飚，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12）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13）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飚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

是吴德抓的。”〔14〕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 ◇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5〕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16〕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17〕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18〕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9〕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20〕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21〕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22〕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23〕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24〕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25〕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26〕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

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7）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28）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29）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 ◇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

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35）、朱穆之（36）、李鑫、华楠（37）、王殊（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

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43）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 ◇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47）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48）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



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50）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51）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54）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55）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56〕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57〕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58〕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59〕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外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61〕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62）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63）“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64）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66）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67）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68）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69）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70）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71）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1） 新华社北京2008年8月31日电：《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2）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9—901页。

（3）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问、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页。

（4） 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页。

（5）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九四七——一九八六）》（下），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1页。这里记载的时间，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所说的时间相差十来天，孰对孰误，尚待考证。

〔7〕 参见《叶剑英年谱》（下），第1108—1111页；《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43—635页。

〔8〕 《十年风雨纪事》，第236—241页。

〔9〕 《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294页。

〔10〕 《李先念传》（下），第902—903页。

〔11〕 《叶剑英年谱》（下），第1110—1113页。

〔12〕 《十年风雨纪事》，第237—250页。

〔13〕 《耿飚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1—516页。

〔14〕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15〕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1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29页。

〔18〕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2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3—155页。

〔19〕 《十年风雨纪事》，第255页。

〔20〕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著：《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6—397页。该书称苏、倪去西山看望邓是1976年底，此说可能有误。如果是去西山，当为1977年2月以后，因为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移住西山的；如果是1976年底，则当是去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看望的。

〔21〕 中央理论学习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成立的，归属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人是李鑫。实际上，这是一个专门为中共高层起草文件的写作班子。不久之后，这个班子并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成为“毛著编办”的二级机构，仍称理论组。

〔22〕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31—1734页。

〔24〕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25〕 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26〕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27〕 李鑫在理论务虚会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28〕 转引自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29〕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49页。

〔30〕 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31〕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

〔32〕 《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时间不详。

〔33〕 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4〕 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35〕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引者注。

- 〔36〕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引者注。
- 〔37〕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军报》总编辑——引者注。
- 〔38〕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辑——引者注。
- 〔39〕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
- 〔40〕 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
- 〔41〕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 〔42〕 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9—1450页。
- 〔43〕 参见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 〔44〕 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1页。
- 〔45〕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 〔47〕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9—740页。
- 〔48〕 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39页。
- 〔49〕 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页。
- 〔50〕 胡绩伟著：《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51〕 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系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
- 〔52〕 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06—407页。
- 〔53〕 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
- 〔54〕 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 〔55〕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22—123页。
- 〔56〕 任平：《抓纲治国》，《人民日报》1977年2月8日。
- 〔57〕 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
- 〔58〕 华国锋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1月5日）。
- 〔59〕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 〔60〕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页。
- 〔61〕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年8月23日）。
- 〔62〕 华国锋在全国计划会议的讲话（1977年12月11日）。
- 〔63〕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全会上的讲话（1977年12月12日），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36页；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
- 〔64〕 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 ( 6 5 ) 从传达记录看，至少有吴冷西、胡绳参加。
- ( 6 6 ) 这五条标准是：一、恢复军队的传统；二、看是不是真正统一了；三、看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观感是不是变了；四、纪律，一起行动听指挥；五、干部队伍要整顿好。见邓小平听取解放军沈阳军区党委常委汇报时的讲话（1978年9月17日）。
- ( 6 7 )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 ( 6 8 )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 ( 6 9 )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1月6日）。
- ( 7 0 ) 吴冷西传达华国锋的讲话（1978年10月10日）。
- ( 7 1 ) 转引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2页。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  
【史海钩沉】

康生的另一面

· 余汝信 ·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间中共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层成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尚未研究透彻的人物。

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如此评价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东省胶南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做白区党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当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留山东工作。一九五〇年后长期养病，六年未做工作。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组织写‘九评’等文章，并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这个人一遇适宜的政治气候，就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善于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在党内兴风作浪；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于他惯于耍反革命两面派手腕，长期掩盖了其阴谋家，伪君子的本相，历史上欠的许多账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积极出谋划策，残酷迫害干部，从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竭力制造混乱，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民愤极大。”

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审查报告》称：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

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

“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一百二十二）；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点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领导干部三百六十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的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本文仅举三例如下。

### 一、关于谭启龙的批示

谭启龙（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济南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1967年11月间，经周恩来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谭启龙，回到山东接受批判。

12月初，谭启龙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与他联系的孙吉太写了一封信，叫他的儿子带到北京。信中称：回山东已二十多天了。回来第三天（十五号）就要我作检查交代，我要求先见见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帮助未允，要求推迟检查让我作些准备亦没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写的学习总结改为补充检查。结果认为是假检（查），真反扑。后来即接受大会、中会、小会批斗，开始进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于大家一定要我承认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认忠实、顽固地执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刘、邓在山东的代理人 and 忠实走卒。引起革命派义愤，结果于昨夜开中心组批斗会议，实行坐喷气机，下跪，我提出意见这样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义愤，给我拳打脚踢，……因此，我只好写信简单告知你，希你转告汪主任一下，我当前处境较困难，可否给我一点帮助请告知。

谭启龙的这封信，有幸还是转到了汪东兴手中。汪东兴于1967年12月19日批示：“请总理阅。”周恩来次日简单地批了几个字，转请负责山东问题的康生处理：“康生同志阅转杨得志、王效禹两同志阅。”

康生看到谭启龙这封信后，其批示是具体、负责的：“请杨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确是坐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并耐心的向群众进行教育。”

康生的这个批示，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谭启龙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谭启龙写了一篇题为《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关怀与保护》的文章，提到了这一段历史。唯文中称：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

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那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与档案材料相对照，谭启龙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失实的。

一、谭启龙这封信，是写给中办的工作人员孙吉太，请孙转告汪东兴，而并非是想通过中办直接转交给周恩来。以谭当时的处境，没有直接向周转告的奢望。

二、这封信是谭启龙本人的亲笔信，并不是他儿子代写的。

三、康生对这封信作了具体的批示，要求杨、王查清情况，“严加禁止”。谭启龙在其回忆中半句也没有提及，可能是并不清楚这一过程，亦有可能是有意回避了康生对其处境的过问。

四、谭启龙不提康生，而将其处境得以改善归功于只对其来信简单批一句话的周恩来，从批示上看，周恩来不过是要杨得志、王效禹看一看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并没有表态。而所谓周恩来打电话责问王效禹，“具体指示杨得志派部队保护我”等等，不知谭是如何得知的？

## 二、关于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5月4日—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问题。会议决定，停止彭、陆、罗、杨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后长达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专案第一办公室所属的彭真、刘仁专案组，向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及叶群作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称：

“大叛徒、大特务彭真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康生加：对审讯、监视、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现在根据查证，彭真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同时为了彻底查清彭真的内奸罪恶活动，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国民党一经逮捕就跪倒在敌人脚下，出卖组织和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根据大量事实又证明，这个家伙还是暗藏在我党内部的大特务。彭真在北平狱中，曾接受国民党反动派任务，答应‘为国民党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狱后，在大叛徒、



大特务刘少奇的旨意下，经过日、蒋特务李铁夫、张秀岩的介绍，到北平住在汉奸、特务机构‘大义社’内，和大汉奸张璧、宋哲元，张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结，进行了一系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初期，彭贼和中统特务胡仁奎串通，在晋察冀各地，设立国民党部，建立特务组织，向国民党反动派发送大量情报，破坏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结成反革命联盟，猖狂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并阴谋搞军事叛变公开投靠蒋匪。解放后，彭真伙同罗瑞卿、刘仁、冯基平等，盗窃大量国家核心机密，送给敌特机关。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潜伏匪特，去台湾参加蒋匪的‘八全’大会，向其献计献策，效忠其主子蒋介石，攻击、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彭真贼心不死，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怀着刻骨的仇恨，对他的种种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还借机大肆放毒。在历次审讯中，他气焰嚣张，在事实面前百般狡辩抵赖，甚至进行疯狂反扑。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罪大恶极，应该逮捕关押对他采取专政措施，同时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内奸罪恶活动，也利今后对他的斗争。”

为什么彭真由卫戍区监护上升至逮捕关押，送至秦城监狱？上述报告缺乏有逻辑性的理据。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并不需要什么理据不理据，关键在于彭真是毛泽东钦点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泽东在1966年4月就说过：“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从“反党集团”的头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仅是一个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罪恶累累的大特务”！

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活动，是为中央政治服务的。对于这个小组所报告的重大问题，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故而，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总理、伯达、江青（请假暂不送）、永胜、富治、叶群同志审批。”我们可以看到，毛、林、周、陈、黄、谢、叶都划了圈，周恩来、陈伯达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两字处。

仅就《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

### 三、关于吴德峰的批示

吴德峰（1896—1976），中共党内曾长期从事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31年起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长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建国后，历任武汉市市长，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文革前，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对外身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为吴德峰事给康生、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据外调人员反映，吴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体很不好，现仍被高等法院群众专政，因两派争议，问题不能解决。”

“据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任当时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

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康生批注：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篡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的，反对王明、博古的，在总理、康老领导下，他对敌斗争是勇敢和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有关文电档案，现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门工作中的情况我不了解，如果历史上没有查出重大问题，希望中央能通过高法院军代表向群众组织作些工作，对他作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对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顾，帮助他向群众作认真的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妥否，请予考虑。”

当天，康生收到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转给周恩来：

“吴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有许多毛病甚至有许多错误，解放后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气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请富治同志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帮助他认真检查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解除群众对他的专政。据说他病的很利害（厉害——编者），应给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当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罗青长同志意见，请富治同志办理，仍以一批、二保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总理的批示，对吴德峰同志应该是一批二保，军代表和×××同志（余注：原件字迹不清）应向群众做工作。”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前身——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对建国前吴德峰的工作，应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对吴德峰的批示，无疑比周恩来的具体、详细，“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我觉得对他应是一批二保”，有这么一句话，也足够了。

从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2011年1月

□ 原载《记忆》第六十八期2011年2月28日

~~~~~

## 【读史札记】

###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 史一平 •

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 ◇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

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岁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页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叙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善于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 ◇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斗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于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 ◇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乾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

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

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页 4 3 4 — 4 3 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页 7 2 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于革命的本能，出于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于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页 3 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于“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页 9 3 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  
【历史回顾】

还原林彪，部下黄永胜填历史空白

• 江 迅 •

黄永胜从监狱出来到去世只是一年多时间，未留下完整文字，没有邱会作、吴法宪那样的手稿或谈话录音，可供查找的出版物能绕就绕。家人核对资料、记录交谈内容，提供了立体历史记录。

六十二岁的黄正是一九六八年三月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之子。在深圳居住二十七年，用他的话说，“既不大贵，也就不可能大富”，如今“有房有车，过着小康生活”。他是父亲传记《军人永胜》的作者。他曾用名“黄春耀”、“项群”，曾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海上文化工作队、四十二军一二六师三七六团服役，转业后曾在广西、青岛深圳多家机构和企业工作。

二月十一日，就父亲传记出版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问：你父亲为什么自己没有写自传？

答：父亲生前不赞同写回忆录。他认为，战争年代的内容，根本不用他写，组织上清清楚楚，文革的内容，却是一笔糊涂账，九一三是怎么发生的，父亲更不知道。当年他就说过，一些回忆录总是拔高自己，高到令人不可信。有些自传，只写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自己如何走麦城，明明是战役指挥员、战术指挥员，只是在一个局部，但往往用大篇幅去描写全局，浪费笔墨。因此，一些回忆录颇受他诟病。

问：你是很早就想写父亲的传记的吗？

答：二零一零年是父亲诞辰百年，家人常常说可以做什么事，以纪念老人。鉴于大家都知道父亲是有名战将，但不论是对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或坊间各种传闻，都难以完整讲述他这个战将完整的战功。零八年，当局对现代史人物的评价、对当代军史人物的评价不再像以往那样必须按中央的统一口径，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不过，有关我父亲的部分，还只是集中在解放战争那段历史，而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包括解放战争初期，几乎都空白。因此，家人觉得，不能再听任这种情况继续，而应该出来做点事。否则，我们这些子孙就是不孝了。因此，最初写这本书，只是从孝心出发，尽可能将老人一生完整重现。一开始我没有准备写成这样一本书。

问：是零八年开始动笔的吗？

答：零八年春天开始立意，开始收集资料。大陆正规出版物上，关于我父亲的文字，包括军事部分，基本上是空白的，作品大都绕开他走；政治部分，很多是胡编乱造、捕风捉影，往他身上随意泼脏水。比较典型的是大陆所谓政治解密的红色作家师东兵，他写的东西基本上全是谎言。他写文革所涉及的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我的评价是不堪入目，毫无根据。一开始想做的只是整理履历那样资料性的东西，这部分内容就是书里标记为军人档案的部分，与老人有关的年代、地点、部队、职务，经历了哪些历史事件，打了哪些仗。这些内容花了我一年时间。我在书店买了一大批军事书，一段段查找，当时父亲在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他的上级是谁，是罗荣桓，罗有详细年谱，父亲是他手下，因此也经历了这些战斗，就这么逐渐搭起一本书的框架。

问：收集资料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首先，我们黄家毕竟有个不足的地方，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到去世，也只是一年多时间，父亲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没有邱会作、吴法宪那样的手稿，也没有他谈话的录音；第二，凡是可以去查找的档案馆，他们都不愿接待我们，总是用公事公办的话搪塞我们，声称不接待个人。有些老干部写回忆录，可以由老干部局、总政治部、新闻机构提供查阅档案的证明，我们却不可能；第三，可供查找的公开的正规出版物中，关于黄、吴、李、邱的内容，是大段空白，能简就简，能绕就绕，能不说就不说。

问：从写作到出版，有没有受到当局阻扰？

答：零九年起，我就开始往这框架里加血肉，写了一年，还算顺手。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是我和家人直接听父亲说的，还有党史上一些老人的回忆录和其他一些正规出版物。二零一零年初，书稿基本杀青。最后是整部书的结构调整和文字润色，而后就开始联系出版，赶在老人诞辰百年前出书，那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书稿拿到香港出版，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只是出版后将书运回大陆须经海关，事情就比较复杂。

问：读者热衷政治解密，最有趣的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事，是你父亲当总参谋长以后，包括九一三事件，但从现在的书看，内容似乎弱了，是你有所顾忌而不愿展开吗？

答：不是我有顾忌，当时我收集资料时，大哥春光也在收集资料，两人几乎同时开始，兄弟间有个默契，我写的内容偏重战争年代，大哥在父亲身边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后期，与老人直接接触的时间多，因此偏重于四九年以后，包括文革、从广州到北京，九一三时间，特别是法庭时期。因此，我写的这部书，在尾章留下充足的空间。我的书在这一时期主要写两大部分，父亲怎么当上总参谋长的，这是父亲直接告诉我的，大哥不在场，因此没有我知道得多。当然，在其他方面，父亲与大哥的谈话更多，大哥是家中长子，这是天然优势。我偏重于战争年代，算是写前传，大哥就可以集中写四九年以后的部分，即后传。

问：关于你父亲晚年的凄惨生活，为什么你着墨不多？

答：主要是担心这部分内容会冲淡“军人”的主题。不过，我是努力写出父亲立体的形象。父亲是将领，但他有他的毛病，有些仗，他没有打下来，比如热辽五战皆平，隆化六攻不克，长征时期打的仗，也有攻而不克的，但他至少没有惨败过，没有丢盔弃甲。他最大缺点就是骄傲、抗上，与政委关系没处理好，我不去评价是非，但事实是存在的，我如实描述。父亲一生有三大空白：井冈山时期，晋察冀时期，冀察热辽时期，没有文字记载，父亲生前对我们也不愿多讲，因为他觉得这时期的仗，他打得很窝囊。因此，我们补这些空白很辛苦。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